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5 - 10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选择的智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集（1996—2000）/（瑞典）珀森（Persson T.）编 寇宗来，王永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ISBN 7 - 301 - 10283 - 6

Ⅰ. 诺… Ⅱ. ①珀… ②寇… ③王… Ⅲ. 诺贝尔奖金 - 经济学家 - 演讲 - 文集 - 1996—2000 Ⅳ. F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566 号

The English edition of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in 2003.

书　　名：选择的智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集（1996—2000）
著作责任者：〔瑞典〕珀森（Persson T.）　编　　寇宗来　王永钦　译
责任编辑：朱启兵
标准书号：ISBN 7 - 301 - 10283 - 6/F·132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1.5 印张　409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5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言

Forward >>



诺贝尔基金会自从1901年以来，每年出版《诺贝尔的价值》，内容包括对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进行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的报道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与获奖演讲。为了使那些对诺贝尔奖不同领域有特殊兴趣的读者接触到这些演讲，基金会授予Elsevier出版公司用英文出版1901—1970年间演讲的权力，这些演讲曾于1964—1972年出版如下：

物理	1901—1970	4卷
化学	1901—1970	4卷
生理或医学	1901—1970	4卷
文学	1901—1967	1卷
和平	1901—1970	3卷

之后，直到2000年，诺贝尔基金会一直授予世界科学出版公司以出版最新的系列以及自1969年开始出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讲的权力。诺贝尔基金会非常高兴看到，由于世界科学出版公司的努力，那些存于获奖者演讲中的智慧的、有灵性的信息，被传送到全世界的读者那里。

董事长 本特·塞缪尔森（Bengt Samuelsson）

执行董事 米切尔·索尔曼（Michael Sohlman）

斯德哥尔摩，2001年8月

序

>> Preface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宪章,“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奖所依据的原则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相同。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遴选获奖者的所有工作。

在每年的12月,就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之前几天,获奖者将举行特别讲座,阐述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在颁奖仪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将作一个主题讲话,简述获奖贡献。这些讲座和主题讲话,连同获奖者的自传,都已收录在四个卷本中。早一些的各卷已经分别涵盖了1969—1980年,1981—1990年和1991—1995年的内容。这一卷则基于1996年到2000年期间所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米尔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ery)在199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是“他们对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的经济理论作出了基础贡献。”[①]他们的工作不但对经济理论带来了一场革命,而且帮助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信息经济学。他们的理论也对从拍卖到所得税系统等现实世界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原因是他们创立了“决定衍生品价值的新方法”。和已故的费雪·布莱克(Fischer Black)一起,两位获奖者得出了一个公式,该公式可以解决金融经济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即如何对股票期权等衍生证券进行适当的定价。他们的解决方案具有巨大的使用价值:每天,在全世界,金融市场中成千上万的人都要使用基于该获奖公式的定价方法。

① 带有悲剧色彩的是,维克里于1996年10月逝世,也就在他知晓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几天。在这种情况下,一篇简短的传记替代了其自传,而获奖演讲则由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让·雅克·拉丰(Jean-Jaques Laffont)的特别演讲代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 Preface

在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因为“其在福利经济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一方面，森的工作解决了经济学和哲学交界之处的基本问题，比如，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下对人的福利的测度问题。另一方面，森的工作也包含了对饥荒和饥饿的详细的案例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导致这些灾难的最终原因在于经济资源的分配，而非纯粹的食物匮乏。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因为“其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其对最优货币区的分析”而荣膺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基本架构。蒙代尔的工作具有近乎预言式的远见卓识。早在实际的政策制定者考虑类似的问题时，他就预期到了现实世界货币制度的未来变化，诸如主权国家接受共同货币。

由于在新兴的微观计量领域所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两位学者分享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工作主要在“选择抽样”方面，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的主要工作则在“离散选择”方面。这些贡献介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其出现和对重要社会问题的应用研究密切相关，也对这些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两位获奖者所发展的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标准工具。

总而言之，这五年的获奖贡献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贡献不但改变了经济学及其相邻科学的研究，也在经济政策的设计、社会计划及市场工具和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

托斯顿·珀森（Torsten Persson）

2003年4月

1996 年经济科学诺贝尔纪念奖

詹姆斯·米尔里斯和威廉·维克里

“由于他们对不对称信息下激励的经济理论所作的基础贡献”

1

伯蒂尔·纳斯兰德的致辞

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伯蒂尔·纳斯兰德（Bertil Näslund）教授的致辞
（瑞典语译文）

>>

尊敬的陛下，尊敬的诸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市场经济是一个传送企业生产成本和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的巨大体系。但有时候这些信息在决策者之间并非是平衡分布的。通常给客户提供贷款的银行对客户未来收入的了解程度不及客户本身。同样，要判断财产损失到底是因投保人对其投保财产缺乏合理关照而致还是由于外在事件而致，保险公司相对于投保人通常具有信息劣势。

在很多情况下，不完全和非对称的信息对于市场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人们可能会策略性地利用这样的信息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致力于这样的分析，即如何设计合同和制度，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对社会福利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研究已经让我们对保险市场、信贷市场、拍卖、工资体系以及税收体系等的运作机制有了更好的理解。

今年的获奖者为分析这些貌似迥异领域的问题创立了方法论基

外部事件所导致的（比如坏天气或者偷盗）。许多经济交易活动都呈现出这种形式。比如说，股东并不总是知道公司的赢利或者亏损是由管理层的行为还是由外部环境所导致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米尔里斯已经能够证明这样的结果，即如何来制定合同从而使得代理人也考虑到委托人的偏好。米尔里斯为解决此问题所发展的方法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得到了应用。

詹姆斯·米尔里斯和威廉·维克里对非对称信息下关于激励的经济理论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在宣布其为今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公告发布后几天，维克里就去世了。遵照其遗孀赛茜尔·维克里（Cecile Vickrey）的愿望，他的奖项将由其故友和同事洛厄尔·哈里斯（Lowell Harriss）代领。

亲爱的米尔里斯教授：

我非常荣幸有特权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向您致以我们最热烈的祝贺！现在，请您接受由尊敬的国王陛下颁发的奖项。

亲爱的哈里斯教授，

现在，请您代表维克里夫人接受由尊敬的国王陛下颁发的奖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而将通常为获得苏格兰学位所需的四年时间缩短到三年。同时，我说服相关部门让我在第一学年参加哲学课程，我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出色的成就。人们认为，在大学课程刚开始就参加哲学课程在精神上是很危险的。但是，我有一个表兄在格拉斯哥研究哲学（现在仍是）。一道在乡间漫步时，他用哲学感染了我。在大学，我们没有参加其他的哲学课程（尽管我后来到剑桥参加过一些讲座），但这一直构成了后来我所涉及的一个研究主题的重要基础。过去，该课程通常是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考试的一部分。

在爱丁堡的那几年里，数学对我来说很简单，只需花很少的时间。通过各种考试，我赢得了许多小额个人奖学金，这使我除了基本的支出后，还有一点点盈余，可购买新企鹅系列的书籍。大学的图书馆具有很不错的开放书架，借阅也很方便。我也能够承担去听一些音乐会的费用。在那时，听音乐会很便宜，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则是初步了解绘画的绝佳去处。大学里有许多交际活动。我离家在外，故也参加这些活动，在“考恩堂”（Cowan House）进行永不休止的哲学辩论，但那时并不涉及很多的政治话题。“考恩堂”现在是一处早已消失的居所。我想，那时对进入“考恩堂”的学生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无论如何，那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

尽管那时数学很简单，但我确信我变得有些粗心。和通常一样，我比较幸运，在最终的考试中赢得了内皮尔奖章（Napier medal）。那年之前，和其他的爱丁堡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一样，我终于参加了剑桥奖学金考试，并由此获得了进一步的资助，以再获一个本科学位。1957 年，我 21 岁。如同许多前人和许多后来人一样，我就像一个兴奋的苏格兰流浪者，带着我的生日礼物，一台打字机，离开了苏格兰。在那个夏天，我已经自学掌握了按指法打字。

剑桥的数学本科学位包括三个部分，或称剑桥荣誉学位考试。要获得学位，完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够了。著名的“争论者”是第二部分课程中的佼佼者。数学最好的人在他们第二学年开始第二部分，

然后在第三学年开始第三部分。我们来自爱丁堡大学 (以及其他大学被认为知识准备尚不足以立即开始研究工作的) 的学生在第一年开始第二部分,而在第二年开始第三部分。在我所参加的三一学院,我们来自爱丁堡的两位很喜欢聆听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的讲课。那非常有趣,但也不是太难。我们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争论者。

在剑桥,你可以参加任何主题的讲座,无需任何正式的手续。我充分利用这个好处。夏天,我写了一篇数学小论文去评奖。我所选题目是博弈论,但我并没有太重视它。结果是我的爱丁堡朋友获奖。接着就是第三部分的数学课程了,其中有当前研究的前沿主题。这些内容很难,而我又想做数学以外的很多东西。结果还不错,如果我愿意,我就可以继续进行研究,但我不想。社会科学,或许甚至是社会学向我招手。研究数学的彼得·斯温纳顿-戴尔 (Peter Swinnerton-Dyer) 将我引见给研究经济学的皮埃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无论如何,我想做的是经济学。一则因为我一直和我学经济学的朋友讨论,但他们不能让我感受到经济学的意义;二则是因为,在我看来,当时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中的贫穷才是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问题,那才是经济学。

我怎样才能得到获取第三个本科学位的资助呢?幸运的是,剑桥有一套制度安排,如果你在一年内通过经济学本科的期末考试 (称之为经济学文凭考试) 的一部分,就可将其视作完成了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当然,仍然要设法获取资助。剑桥每个学院的所有学生都有一个导师。导师在管理上而非学术上对这些学生进行全面的关照。每个导师都带很多学生。不知以何种方式,我的导师让科学和产业研究系给予我一个三年期的奖学金,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有一个有趣的激励合同:我并不一定要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如果我不想拿博士学位,那么我必须写一个类似篇幅的毕业论文。我没有询问 (违反合同) 会有什么样的制裁,我只是接受了这个合同,就开始学习了。不知什么原因,第一年期末时的主考官误认为我懂得一些经济学。学习经济学是要花一些时间的,即便很多内容非常简单,或对或错都非常简

单,但区分这些东西的对错并不容易。

戴维·钱伯瑙恩(David Champernowne)那时刚刚离开牛津的讲席回到剑桥任教,并获得三一学院(Trinity)的教职。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在牛津,人们不太欣赏科学构想和计算机,所以他返回了他所谓的经济学中心。自学或者跟另一个人学习看起来特别浪费时间和成本高昂,但我已经由此受益良多,并依旧自学自乐。如果这种方式起作用,那通常不是经由简单的信息传递而实现的。戴维开始的方式是让我去读凯恩斯的《通论》。我想这是因为他恰好正在重读该书。那或许不是最好的建议,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读完它。不用说,我也很依赖许多同学,他们实际上都极其慷慨地教我东西。那是合作的时期。我读书的范围依然很随意,而剑桥名家卡恩(Kahn)、卡尔多(Kaldor)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讲座和研讨会也都极具特点特质。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时期。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是我正式的指导老师,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在第一学年刚结束,他就让我参加他刚刚启动的一个"增长项目"。该项目旨在以可实施的方式刺激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指引研究方向的东西是指标规划,一个已被忘却的概念。斯通将我指引到拉姆齐关于最优储蓄的工作(这也是戴维·钱伯瑙恩的兴趣所在)。就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点,我发现了萨缪尔森和数理经济学。我尝试着写研究论文,其中多数都是垃圾。迪克[①]送给刚刚被卡尔多吸引到剑桥的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某些我写的东西,我忘了那究竟是什么。不知什么原因,弗兰克·哈恩在那些垃圾作品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这真是鼓舞人心。他成了我另一位非正式指导老师和伟大的精神导师。那年,我本应感到失落和困惑,但我受到鼓励,非常幸福。而当吉尔(Gill)在剑桥完成了教师培训之后,我们就完婚了。所以,我们去苏格兰度蜜月,随身带着打字机。我开始做三一学院的奖学金毕业论文。考虑到我没有做出什么发现,那看起来只是一

① 迪克(Dick),为理查德(Richard)的昵称——本书编者注。

个初步的计划。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一份复印件：《对经济规划理论的贡献》。无须细看，我确信没有什么贡献。我把东西交上去以通过十月份进行的考核，但没有成功。我不记得有什么失望之情。只是当我得知我的论文和通过考核的要求差距并非很大时，我感到有些吃惊。无论如何，写两百多页的东西是一种了不起的学习方式。在那篇论文中，我极少用到数学。

我一直在思考规划的问题，这是斯通的增长项目的主要议题。受数学文化的影响，我设想将出现一个真正的想法和灵感。而在 1961 年 11 月的某一天，它真地眷顾了我。看起来，我不合适地忽略了不确定性，所以，我试着思考不确定性的程度如何影响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我想出一个对此问题进行模型化的简洁方法。和那时候任何其他人所想的不同，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通的结果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将使得人们储蓄更多而不是更少。我开始使用维纳过程，并自己发现了伊藤微积分。当然了，如果能够学习一些已知的技术，我的方法将更容易被理解，但我不知那儿才能找到这些技术。

论文本来应该在学年末就修改完成了，但发生了两件事情。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想找一位研究助理，帮助写作一篇关于增长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一个著名系列文章的继续。戴维·钱伯瑙恩将我们拉到了一起。尼基[①]数学不是太好，所以我正是他所需要的。最后，他非常大度，让我成为合作者。这篇文章有些混乱，但我们长时间的讨论是令人愉快的经历，因为他努力让我明白经济增长的含义，而我则努力去搞清楚他的意思。合作进行了一个月左右，而且是全日制的，所以，我论文的写作就被耽搁了。

然后，阿马蒂亚·森建议并安排我应该去印度一年，参加由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所主持的 MIT 国际研究中心的印度项目。罗西[②]告诉我，我必须先在暑假到 MIT 去“适应”，所以

① 尼基（Nicky），尼古拉斯（Nicholas）的昵称——本书编者注。
② 罗西（Rosie），罗森斯坦（Rosenstein）的昵称——本书编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